

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北朝墓 M1 发掘报告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

【摘要】: 2008 年，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附近发现一座北朝时期墓葬。该墓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墓，是徐州地区南北朝至唐初流行的墓葬形制。出土瓷器、陶器、陶俑等多件。据随葬品特征以及出土铜钱判断，墓葬年代应为北魏末期至东魏初期。其文化面貌反映出徐州在北魏汉化深入的背景下对于北方政权认可的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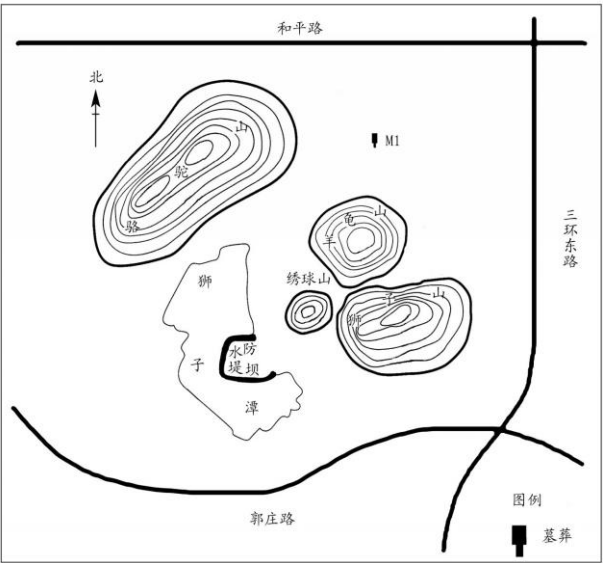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徐州 北朝 墓葬 青徐豪霸 南北之争

【中图分类号】: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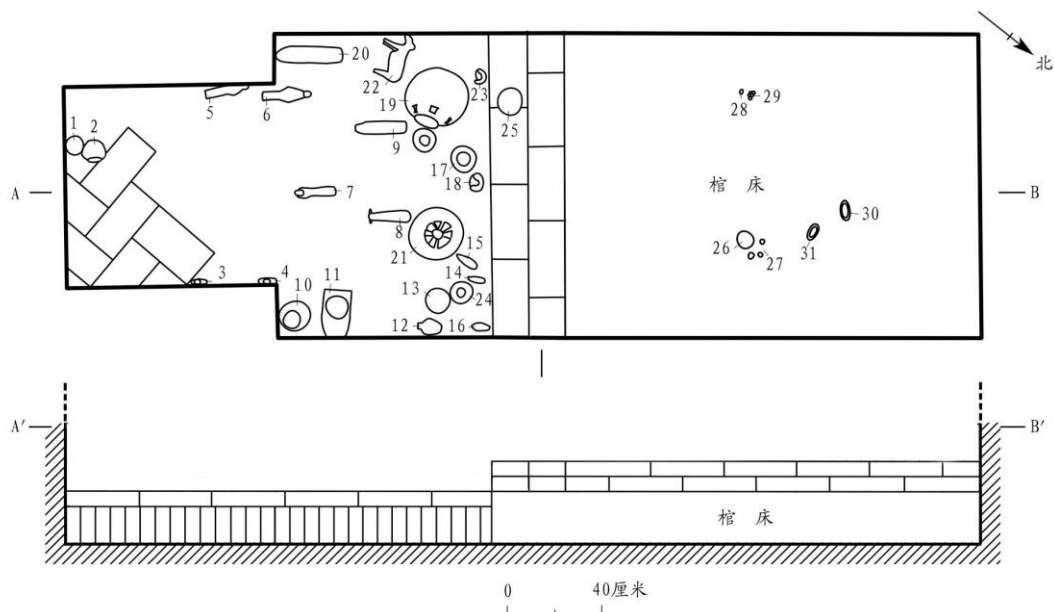
2008 年 5 月 13 日，施工单位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骆驼山脚以东 200 米的世茂一期建设工地，进行挖掘基坑作业时，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图一）。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到现场，立即进行现场保护。经勘察，该墓为砖室墓，墓室上部已被挖土机完全铲除破坏，墓圪已无法辨认，仅剩砖室墓底。现场散落瓷器残片若干。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编号为 08LTSM1，以下简称 M1。

一、墓葬形制

该墓为券顶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方向为北偏西 40° 。墓葬在发现时上部已遭铲除殆尽，墓室北端残留券顶迹象。墓长 3.94、宽 1.32 米。墓葬由甬道和长方形墓室构成，墓室内又分为地面和棺床两部分。甬道长 0.91、宽 0.87 米。前室长 0.95 米，棺床长 2.08 米。甬道地面与墓室地面相平，甬道墙残高 51.5 厘米。墓壁砌筑方法为三顺一丁，甬道和墓室地面为一层立砖加一层人字形平铺砖，棺床则为三层平铺加一层立砖，高出前室约 13 厘米（图二；彩插七：1）。甬道残深 51.5 厘米。墓砖规格为 $31.5 \times 16 \times 6.5$ 厘米。棺木已朽，残存头骨痕迹和部分腿骨，据之判断为单人葬，头向墓门。



图一//08LTSM1 墓葬位置示意图



图二//M1 平、剖面图

1. 瓷碗 2. 陶盂 3、5. 陶侍俑 4、6. 陶武士俑 7. 陶人面神兽俑 8、9. 陶马 10. 陶磨 11. 陶灶 12. 陶壶 13. 陶槁 14、15. 陶鸭 16. 陶鸡 17. 陶匣 18、23. 陶狗 19. 莲瓣纹青瓷六系盖罐 20. 陶骆驼 21. 青瓷四系盘口壶 22. 陶牛 24. 陶托钵 25、26. 铜镜 27、28. 铜钱

二、随葬品

该墓共出土文物 31 件/套（铜钱依出土位置按 2 件计算）。其中 1 件铜镜、若干小铜钱及铁环锈蚀严重。

1. 瓷器 3 件

青瓷六系盖罐 1 件（M1：19）。圆形盖，回字型钮，钮的每边有两道刻划竖线，下刻莲瓣纹。罐圆唇直口，其肩部对称两侧分别有两桥形系，另两侧分别有一桥形系，圆肩，鼓腹，最大径在器中部，平底，肩腹部刻划莲瓣纹。外施青釉，釉不及底，灰白色胎质。口径 11、最大径 22、底径 11.8、通高 22.3 厘米（图三：1；彩插七：4）。

青瓷四系盘口壶 1 件（M1：21）。盘口，细颈，弧肩，鼓腹，平底。颈部有二箍痕，肩部有四系，施绿釉，釉不及底，露出灰白色胎。口径 14、最大径 17.5、底径 10.4、通高 25 厘米（图三：2；彩插七：5）。

碗 1 件（M1：1）。直口，深腹，饼状足。所施釉剥落严重，灰白色胎质。碗中有三支钉痕迹。口径 9.8、底径 4、通高 4.8 厘米（图四：1；彩插七：2）。

2. 陶器

（1）容器 5 件。皆为泥质灰陶，素面。

盂 1 件 (M1:2)。鼓肩,斜收至底,平底。底部有辐射状线刻,肩腹部略有残缺。口径 4.4、最大径 11、底径 5、通高 8.5 厘米 (图四:4;彩插七:3)。

壶 1 件 (M1:12)。直口,圆唇,鼓肩,从肩腹部斜收至底,平底。肩上一对桥形系。口径 3.2、最大径 6.8、底径 3.6、通高 8.6 厘米 (图四:2)。

匱 1 件 (M1:17)。单侧有一个把手,口部分缺失,斜收至底,平底。口径 12、底径 8、通高 5.4 厘米 (图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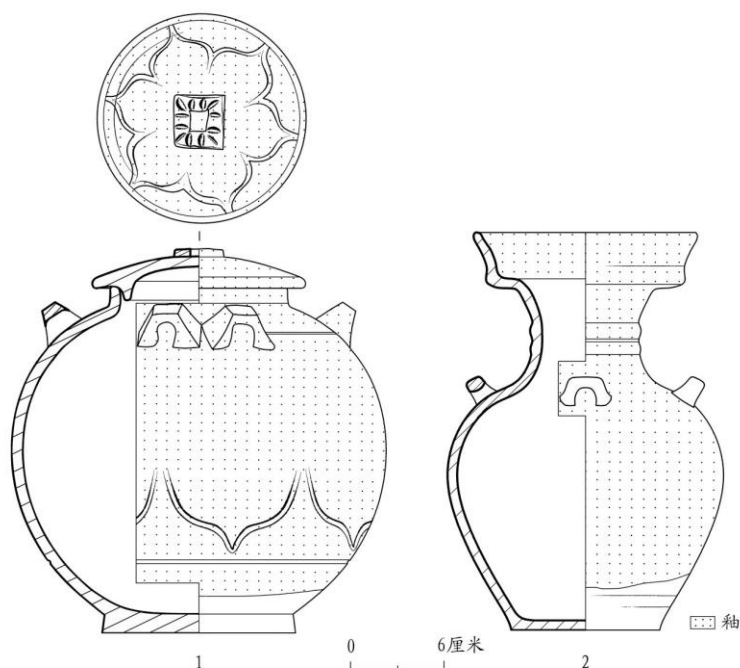
托钵 1 件 (M1:24)。盏敛口,深腹,与托盘成一体。盘圆唇,斜腹,平底。盏口径 4.4、托盘口径 8、底径 6、通高 3 厘米 (图四:3)。

榻 1 件 (M1:13)。分为内外两部分,圆形,中空,内三格,外八格。直径 8.4、通高 3.7 厘米 (图四:6;封三:6)。

(2) 俑 5 件。皆为泥质灰陶,素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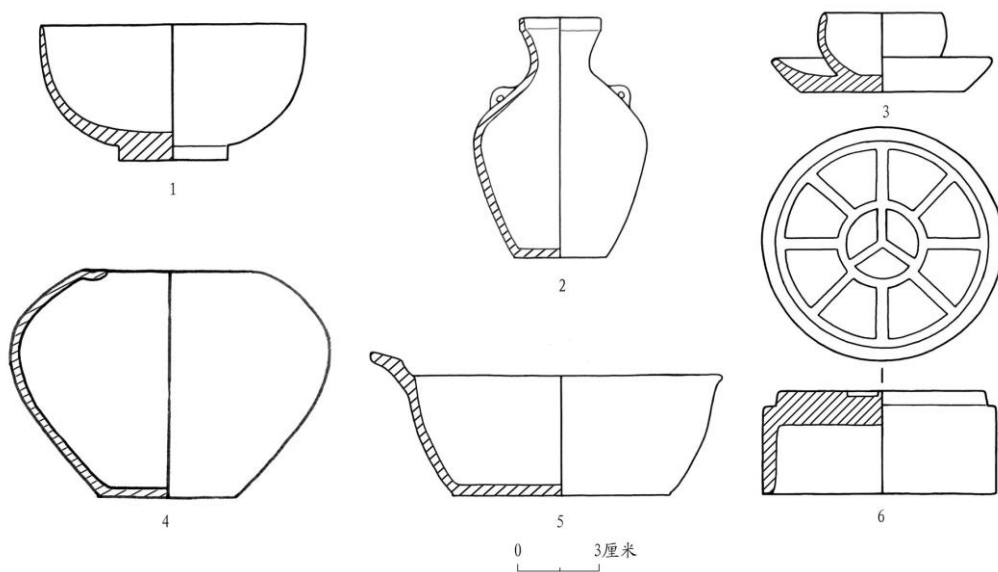
侍俑 2 件。内穿圆领衣,外罩左衽宽袖外衣,衣裙曳地,体形较清瘦。M1:5,束发,头梳双髻,手被帔帛状物所遮。通高 28 厘米 (图五:3)。M1:3,头戴小风帽,双手拱于胸前扣合。通高 27.2 厘米 (图五:4;封三:1)。

武士俑 2 件。面相清秀,内穿圆领衣,外罩右衽宽袖外衣,宽肩,双手并持一剑,衣摆曳地。M1:6,头戴小冠。通高 31.8 厘米 (图五:1;封底)。M1:4,头戴平巾幘。通高 32 厘米 (图五:2;封三:2)。



图三//出土青瓷器

1. 莲瓣纹青瓷六系盖罐 (M1:19) 2. 青瓷四系盘口壶 (M1:21)



图四出土陶瓷器

1. 瓷碗 (M1:1) 2. 陶壶 (M1:12) 3. 陶托钵 (M1:24) 4. 陶孟 (M1:2) 5. 陶匱 (M1:17) 6. 陶桶 (M1:13)

人面神兽俑 1 件 (M1:7)。泥质灰陶，素面。人面兽身，昂首蹙眉，头戴鸡冠状帽，前腿直立，后腿蹲踞坐，两腿略有残缺。通高 17.6 厘米 (图六:10; 封三:3)。

(3) 陶动物 9 件，泥质灰陶，素面。

马 2 件。四腿站立，低头，尾部朝下。M1:8，长 16.5、通高 10.1 厘米 (图六:8)。M1:9，长 23、通高 17.4 厘米 (图六:7; 封二:1)。

鸭 2 件。脚下均踩一泥质饼状底。M1:14，直立，嘴部残缺。通高 6.4 厘米 (图六:5)。M1:15，作低头觅食状。通高 3.8 厘米 (图六:3; 封二:2)。

鸡 1 件 (M1:16)。为公鸡，直立昂首向前，脚下有一饼状底。通高 7.4 厘米 (图六:4; 封二:3)。

狗 2 件。M1:18，呈蜷卧状。长 7 厘米 (图六:2; 封二:4)。M1:23，前腿直立，后腿蜷卧，脸部残缺。通高 6.1 厘米 (图六:1)。

骆驼 1 件 (M1:20)。直立，目视前方，双驼峰。长 24、高 19 厘米 (图六:9; 封二:5)。

牛 1 件 (M1:22)。四腿站立，目视前方，尾部朝下，头部略为残缺。长 23、通高 16.8 厘米 (图六:6; 封二: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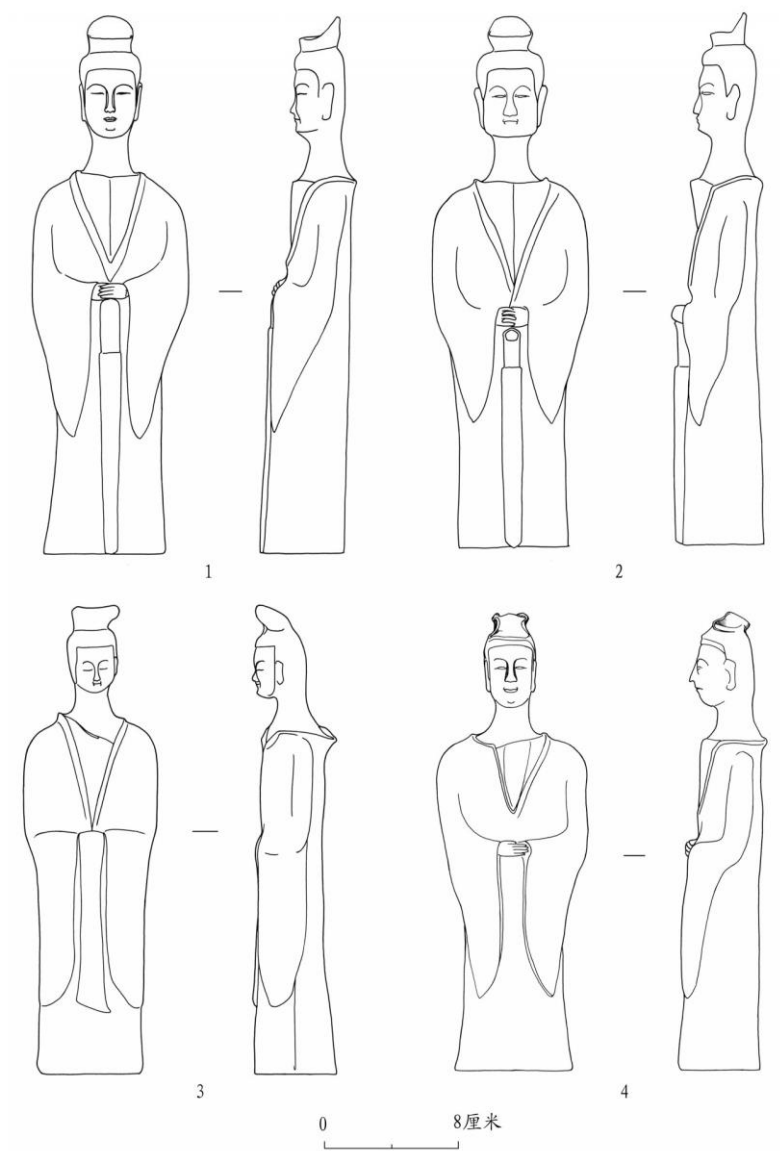
(4) 模型器 2 套 3 件，均为泥质灰陶，素面。

磨 1 套 (M1:10)。磨盘为扁圆形，中间凸起一圈，内有二小孔，磨台呈圆筒状，内中空，磨盘与磨台相连部分及磨台上有辐射状线刻。磨台外径 13.6、高 4、磨盘外径 7.8、通高 6.1 厘米 (图六:12; 封三:4)。

灶1套（M1：11）。略呈长方形，火门呈长方形，挡火墙呈阶梯状，灶台长20.3、高8.2厘米。灶台上有一灶眼，灶眼内有一釜，与灶台连为整体。釜上置甑，甑口径9.4、底3.4厘米（图六：11；封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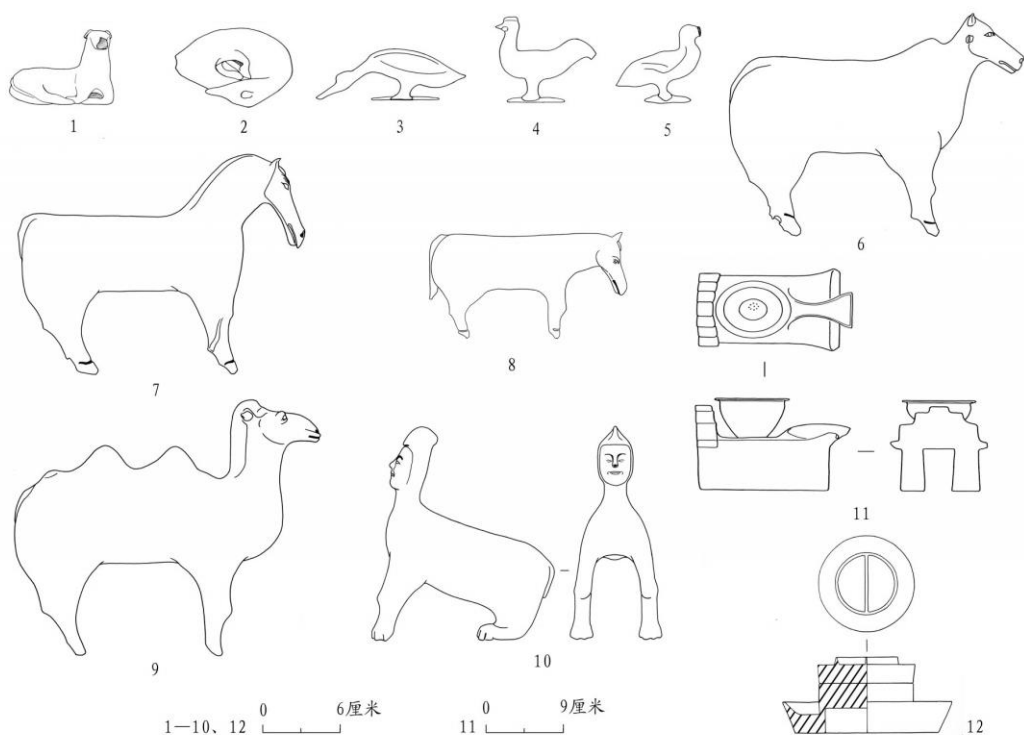
3. 铜器

（1）铜镜2件。M1：26，残为五块，修复完整后呈圆形鼻钮铜镜，镜面微凸，上有铁锈痕迹，宽缘斜边，缘层有一层弦纹。内区饰柿蒂纹相连，铭文仅可辨一字“吉”。直径9厘米（图七：1）。



图五//M1 出土陶俑

1、2. 武士俑（M1：6、4）3、4. 侍俑（M1：5、3）



图六//M1 出土陶器

1、2.狗 (M1:23、18)3、5.鸭 (M1:14、15)4.鸡 (M1:16)6.牛 (M1:22)7、8.马 (M1:8、9)9.骆驼 (M1:20)10.人面神兽俑 (M1:7)11.灶 (M1:11)12.磨 (M1:10)

(2) 铜钱约 12 件。其中“永安五铢”9 枚。M1:28, 圆形方孔, 正面有内外廓, 锈蚀严重。直径 2.2 厘米 (图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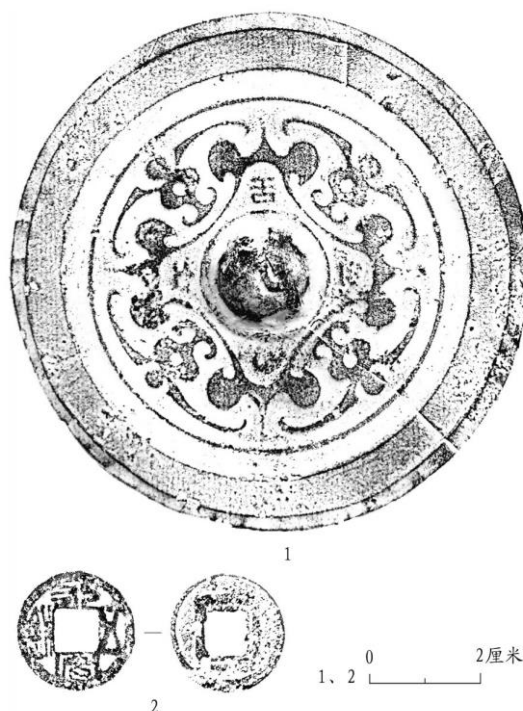
三、结语

M1 出土了较多的永安五铢。永安五铢铸行于北魏永安二年 (529 年)。“建义初, 重盗铸之禁, 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 诏更改铸, 文曰‘永安五铢’, 官自立炉, 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1]。墓葬未发现明显的盗扰痕迹, 其上限则可以定为永安二年。《通典》亦载其事, 曰“官自立炉, 亦听人自铸, 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2]。永安五铢在发行时当为官民并铸的情况。

关于永安五铢的废止, “齐神武霸政之初, 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以后, 百姓私铸, 体制渐别, 遂各以为名……冀州以北, 钱皆不行, 交易者皆以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 仍依旧文更铸, 流之四境。未几之间, 渐复细薄, 奸伪竞起。文宣受禅, 除永安之钱, 改铸常平五铢, 重如其文”^[3]。前世之钱用于后世, 其例极多, 故墓葬的下限只能以常平五铢的铸行年代天保四年 (553 年) 为参考。

M1 共出土了 4 件陶俑, 其出土时皆位于甬道两侧近墓室处, 每侧各二, 前为侍俑, 后为武士俑。这四件陶俑, 面目清秀, 形体瘦高, 不同于邺城地区所出土的陶俑, 而是类似于洛阳传统, 亦或说是南朝影响下云冈风格的延续。宿白先生曾认为中原北方地区在造型艺术上有两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为北魏孝文帝在平城推行汉化改制的时期, 受东晋刘宋时期顾恺之和陆探微“秀骨清像”画风的影响, 云冈石窟佛像造型在太和十三年 (489 年) 以后, 从昙曜五窟深目高鼻、通肩右衽的西域影响, 转变为摹

仿南朝士大夫形体清瘦、褒衣博带的汉式服装造型^[4]。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迁洛以后，这一风格亦在龙门、巩县石窟中继续流行。M1 所出的四件陶俑，便是“秀骨清像”这一风格的典型表现。



图七//M1 出土铜器

1. 铜镜（M1：26）2. 永安五铢（M1：28）

如此便需谈论徐州在南北朝时期佛学文化中的地位。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北朝佛学时曾提到：“北方义学之渊源，孝文帝时，实为徐州为最著。”^[5]在北魏时期，道融、慧义、东阿慧静、僧嵩等诸位论学大师皆曾授学游历于徐州及周边。北魏僧渊的弟子知名者有四人，其中道登、惠纪、昙度等人皆为孝文帝所重，而僧渊初游徐州时，便在白塔寺从僧嵩受《成实》、《毗昙》二论^[6]。太和十九年（495 年），孝文帝曾亲幸白塔寺凭吊僧嵩居寺，昙度更是“造徐州，从僧渊法师更受成实论……既达平城，大开讲席，（元）宏致敬下筵，亲管理味”^[7]，可见孝文帝之推重。孝文崇法，已深入义理，而平城佛教此时又倍受徐州影响^[8]。佛学义理研究的繁荣，实际上也是徐州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侧面体现。徐州在北魏时期为繁华之地：“（尧）暄至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华盛，乃令往往毁彻，由是，后更孙络。及孝文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9]且青徐多术艺，其地在皇兴三年（469 年）入魏以后，不仅高僧北上，文艺亦徙平城，皇信堂、太庙、太极殿等的营建，皆与青徐营户有关；青齐入魏以后，北方既获得了南朝术艺，也便利了南北交往，为北魏的汉化的不断深入提供了重要条件^[10]。佛像造型秀骨清像以及褒衣博带式的服饰，皆是南朝文化影响的结果，徐州便是这一影响路径的重要节点。徐州长时间位于南朝政权统治下，即使在入魏以后，这一地区的造像风格，相对于平城与洛阳，也当最先受到南朝文化之沁润。看似 M1 所出四件陶俑是云冈或洛阳影响下的结果，实乃徐州在前，而云冈在后，更毋论洛阳。

宿白先生所说的第二次变化，便是自南朝萧衍建梁之后，“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南朝风尚一大变化，反映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张僧繇画派“骨气奇伟”，变重神骨为“得其肉”，变清瘦为丰壮。这一变化，在南齐已现端倪，南朝萧梁逐渐发展，大约于梁武帝中期影响及北魏洛阳，并完成于北齐时期。洛阳城内永宁寺塔所出神龟二年（519 年）的一批塑像，就与萧梁人物极

为接近^[11]。北魏晚期洛阳地区元邵墓^[12]、染华墓^[13]以及东魏冀州地区高雅墓^[14]所出陶俑，就是这第二次变化的直接表现。至东魏北齐时期，这一造型风格的运用更是极尽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永安五铢的发现将墓葬年代上限定为永安二年，其年代也自然晚于元邵墓（武泰元年，528年）和染华墓（孝昌二年，526年）。但M1所出陶俑，明显属于更早的流行造型。在洛阳乃至邺城地区深受“骨气奇伟”的造型特征影响的时候，徐州地区却孑然而为一孤岛。

M1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陶瓷器也有着明显的南朝遗风，但其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所流行的多小龕、直棖窗、棺台之类设置的单室券顶墓^[15]有着诸多差别，更似在单室券顶墓的基础上独立发展而来。溯寻其迹，可发现其形制与南京王兴之夫妇墓^[16]、南京刘宋明昙懋墓^[17]乃至长江中游湖北枝江姚家港晋墓^[18]基本一致，可略窥其对于东晋刘宋时期墓葬形制明显的继承关系。

M1所出盘口壶，其形制出现于东晋中晚期^[19]。与其类似形制的器物可在枝江姚家港晋墓（M3：25）、江西九江陶渊明纪念馆东晋墓（I式盘口壶）^[20]、江西大余元嘉八年刘宋墓（印纹陶盘口壶）^[21]中发现，其流行年代大致在东晋中晚期至刘宋早期。与同时期南朝中晚期墓葬所出瘦高的盘口壶不同，M1所出盘口壶与墓葬形制一样，皆保有着东晋至刘宋以来的传统，而非同时期南朝齐、梁所流行的文化因素。

M1所出青瓷六系罐将六系桥形钮、腹莲结合，形制较为独特。腹部雕莲的青瓷罐，南北皆有发现。南朝有江苏句容西斛村墓^[22]、浙江瑞安天监九年墓^[23]，其制作皆不如M1精细。北朝墓中此类器物发现更多，也更为发达，如河北平山崔昂墓^[24]、磁县茹茹公主墓^[25]、河南濮阳李云墓^[26]。李云墓出土了青瓷六系罐、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件，为北朝瓷器的精品，其中一件四系罐亦是桥形钮与腹莲结合，其制作更较M1成熟。

刘宋泰始二年、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北魏始有徐州，自此淮泗之地尽为魏有，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自此先后被北魏夺去；南方则退守淮阴—寿阳一线，攻守之势完全转换。若依魏祚迁邺的535年算起，期间徐州虽有短暂易手，此时属魏已有近70年。但M1仍有着相当部分的南朝文化因素，且带来这种因素的并非是与同时代的齐梁政权。

如此可见M1所表现出的徐州北魏末至东魏初这一时期的文化，既区别于洛阳、邺城，也不同于南朝。其墓葬形制、青瓷器乃至陶俑造型，皆继承于东晋刘宋时期的南朝文化，即便在入魏以后，仍保有着这一文化特征而不作改变。继续发展变化的南朝文化，在越过徐州影响至洛阳、邺城时，这一文化特征亦未作改变。

历来学者在论述北朝墓葬时，多将徐州归于青齐地区，亦或将其概括为南北文化交流之地。但北魏太和改制之前，徐州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地位。这种独立的中心地位，日本学者早有关注^[27]。徐州地区较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有着对于南朝传统的强烈认可，即使在其入北魏后依然存在。但徐州地区的器物特征，与同时期南朝亦有着相当差异，徐州即使从南朝再受最新的影响，也不立即效仿，而是在汲取中保有着相当的独立乃至排斥性。

早在汉魏之时，青徐豪霸即是影响政权稳定及北方统一的关键问题^[28]。刘裕灭南燕后，原居青齐的王玄谟、申宣、垣护之等南迁徐州，刘宋政府亦利用徐州豪族以达到镇抚青齐的目的^[29]。淮北四州入魏以后，曾有大量豪族南迁郁洲，并成为萧道成篡夺刘宋政权的关键力量^[30]。但仍不乏诸如彭城刘氏之族留守徐州，并成为北魏政权控制地方的有力力量^[31]。丛亭里刘氏在彭城有着庞大的宗族势力，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进攻徐州，北魏即把徐州事务委任刘芳处理，以利用丛亭里刘氏影响，来稳定徐州形势。刘氏在南北均有居官，且多与乡里宗族保持联系，以利观望，而南北朝廷亦利用其稳定局势，发展势力。M1的墓主，或即与斡旋于南北朝之间的徐州豪强有关。

与此同时，青齐地区连带徐州的豪族，多有骚动不安而意图南叛者，亦成为南齐对抗北魏的重要阵地。《魏书·张敬叔传》：

“张说子敬叔，先在徐州，初闻父丧，不欲奔赴，而规南叛，为徐州所勒送。”^[32]《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淮北四州民不乐属魏，常思归江南，上多遣间谍诱之；于是徐州民桓标之、兖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为盗寇，聚众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33]《南齐书·李安民传》：“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34]

但萧齐政权并未与青齐豪族形成“王与马，共天下”般的密切关系，淮北四州豪族离开桑梓故园南迁后，颇受南齐政权的挤压^[35]。相反的是，北魏太和年间采取汉化政策以后，北魏政权对于淮北四州的安抚颇为缓和。《北史·元鉴传》：“鉴上书遵孝文之旨，采齐之旧风。”^[36]北魏在全国范围推行汉化政策，无疑会博得处于秦汉魏晋时期文化重心的青齐徐兖地区豪族的好感乃至认同^[37]。孝庄帝永安二年，北海王元颢为梁武帝所遣，率兵北上，期间派使者与青齐豪族接触，皆被其驳斥，且被视作“是作贼耳”^[38]。

同时徐州在入北魏以后对洛阳仍有着相当的离心力，在其任者多有宗亲。尽管如此，于洛阳乃至邺城所言，徐州亦是避过良所。《北史·王遵业传》：“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自求徐州。”^[39]《北史·高乾传》：“乾因劝神武受禅……及频请而帝不答，乾惧变，启神武，求为徐州。”^[40]

徐州豪族在接受北魏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于其所继承的南朝文化的追求。徐州地区“秀骨清像”造型的存在，当由来已久。在平城以及洛阳通过徐州汲取南朝文化因素的同时，徐州对于洛阳的认可也在随着北魏汉化的深入而逐渐加强。“秀骨清像”特征的造像，无疑成为这两者糅合的最好载体。其既满足了徐州豪族对于其追求的南朝文化，也表示了其对于洛阳政权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徐州在北魏晚期至东魏早期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文化。这种发展，直到东魏尤其北齐时邺城对于徐州控制的加强而削弱。

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北朝墓 M1 出土陶动物



1. 马(M1 9)



2. 鸭(M1 15)



3. 鸡(M1 16)



4. 狗(M1 18)



5.骆驼(M1 20)



6.牛(M1 22)

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北朝墓 M1 发掘现场及出土器物



1.M1 发掘现场(东南—西北)



2.瓷碗(M1 1)



3.陶孟(M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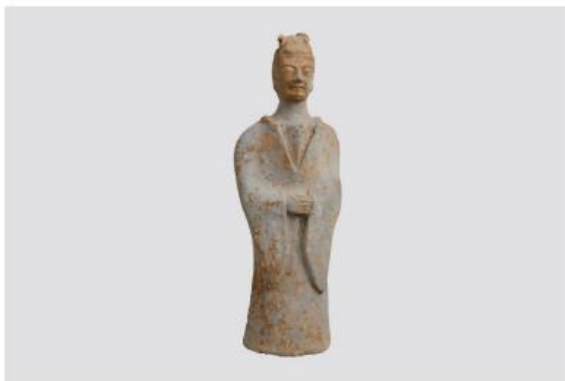


4. 莲瓣纹青瓷六系盖罐(M1 19)



5. 青瓷四系盘口壶(M1 21)

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北朝墓 M1 出土陶器



1. 侍俑(M1 3)



2. 武士俑(M1 4)



3. 人面神兽俑(M1 7)



4. 磨(M1 10)



5.灶(M1 11)



6.碾(M1 13)

参考文献:

- [1]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865页。
- [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第九《食货九·钱币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195页。
- [3]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九·食货》,中华书局1973年,第690页。
- [4]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49-354页。
-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十章“北朝之佛学”,中华书局1955年,第830页。
- [6]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第八《义解五·齐伪魏济州释僧渊》,中华书局1992年,第303页。
- [7]同[6],第304页。
- [8]同[5]。
- [9]同[1],卷四十二《尧暄传》,第955页。
- [10]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 [11]同[4]。
- [12]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
- [13]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 [14]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

-
- [15] 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9 页。
- [16] 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 年第 6 期。
- [17] 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太平门外刘宋明昙懋墓》，《考古》1976 年第 1 期。
- [18] 姚家港古墓清理小组：《湖北枝江姚家港晋墓》，《考古》1983 年第 6 期。
- [19] 刘建国：《东晋青瓷的分期与特色》，《文物》1989 年第 1 期。
- [20] 刘晓祥：《江西九江县东晋墓》，《南方文物》1997 年第 1 期。
- [21] 张小平：《江西大余清理一座南朝宋纪年墓》，《考古》1987 年第 4 期。
- [22]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句容陈家村西晋南朝墓》，《考古》1966 年第 3 期。
- [23] 潘知山：《浙江瑞安梁天监九年墓》，《文物》1993 年第 11 期。
- [24] 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 年第 11 期。
- [25]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4 期。
- [26] 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 年第 9 期。
- [27] [日] 八木春生、小沢正人、小林仁：《中国南北朝時代の“小文化センター”の研究—徐州地区を中心として鹿島美術財団年報（15 別冊）》1997 年，第 464-479 页。
- [28] a. 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 年第 6 期；b.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97-126 页。
- [29] 田余庆、腾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376-389 页。
- [30] 罗新：《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年，第 147-175 页。
- [31]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 [32] 同[1]，卷六十一《张说传》附《张敬叔传》，第 1369 页。
- [33] 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一》“太祖高皇帝建元元年”条。
- [34]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二十七《李安民传》，中华书局 1972 年，第 508 页。

[35]同[31]。

[36]唐·李延寿：《北史》卷十六《元熙传》附《元鉴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593 页。

[37]同[31]。

[38]同[1]，卷六十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第 1483 页。

[39]同[36]，卷三十五《王慧龙传》附《王遵业传》，第 1291 页。

[40]同[36]，卷三十一《高允传》附《高乾传》，第 1143 页。